

探究“农耕为本”史对西部发展的影响

——沙尘暴启示录

尕藏才旦

(西北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中国传统的“农耕为本”思想导致了历史上持续的开荒垦田, 特别在西部造成了大面积沙化、荒漠化; 解放后, “农耕为本”仍产生影响, 表现在全国生产领域推行“以粮为纲”方针, 掀起了多起垦荒热潮, 今天的沙尘暴及其他自然灾害就是报复; 纠正“农耕为本”的片面性, 消除其影响, 关键是深入“科教兴国”, 提高全民族的认识水平, 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 制定科学的、立体的、因地制宜的生产方针, 我们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关键词】“农耕为本”; 后果; 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1)03-0019-11

20 世纪下半叶, 在中国诸多自然灾害中, 沙尘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媒体中, 越来越深入到中国西北、华北, 甚至华中、华东、西南之地, 给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身心健康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害。

我国沙尘暴几乎是跳跃性地膨胀起来的。50 年代 5 次, 60 年代 8 次, 70 年代 13 次, 80 年代 14 次, 90 年代 23 次, 2000 年 1 年就发生 13 次, 而 2001 年未过 4 月, 就发生了数十次, 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壮观”, 声势浩大, 近 20 个省的城市受沙尘污染, 远至重庆、南京和杭州等地。沙尘暴所经之地, 大风裹挟沙尘如黑云翻滚, 遮天蔽日, 逢地地毁, 交通中断, 电路不通, 商店工厂闭门, 给当地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在沙尘暴肆虐下, 我国土地沙化越来越厉害。50 至 60 年代为 1 560 平方公里; 70 至 80 年代为 2 100 平方公里; 90 年代为 2 460 平方公里, 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这仅仅是直接表露的损失, 还有草原、田地的荒漠化, 降雨量的大幅度下降, 全国储水量的减少, 蝗灾、鼠灾、旱灾、洪灾的频起。一个无情的、严酷的、恶性循环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容选择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同样一个地球村, 同样一个红太阳, 为什么沙尘暴却这样“青睐”中国大地? 那我们就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寻找原因。症结是什么? 病灶在哪里? 惟有如此才能“对症下药”, 根除沙尘

【收稿日期】2001-04-23

【作者简介】尕藏才旦(1944-), 男(藏族), 甘肃甘南人, 现为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 主要从事藏学研究。

暴。

对于此方面,我国学者、专家已有广泛的探讨,大量开荒是其中原由之一。但却很少有人探究中国人为什么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执著地要开荒垦田,不停顿地扩大耕地面积?是什么指导思想驱使他们一直要走这条路?大量垦田的原因有什么?为什么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史充斥着那么多开荒垦田的内容?为什么感觉了无限制开荒垦田所带来的大自然报复,但却无法自拔而重蹈覆辙?为什么共和国成立后,多次禁止过垦却令行不禁?为什么开荒垦田成为全民族难以自禁的行为方向?这一切恐怕得从传统思想观念上寻根子,从根深蒂固的“农耕为本”究底子,得从我国国民的价值取向中寻找根源。

农耕为本,小农经济的观念

任何观念形态产生的土壤是经济基础,经济是意识的基石,而经济又取决于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

人类生存的四大环境要素是阳光、空气、水、土地,但大自然赐与的这四大宝物又因地制宜,差异很大。正是阳光、空气、水、土地规范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的实质内容,从而也产生了最早的不同生产方式——采集、渔猎。采集演化为农业,渔猎分化出了畜牧业、狩猎业、渔业。

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最早被规范的生产方式是农耕,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过的是“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1]的农耕文化生活。

为什么要选择农耕呢?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因为,一方面,人类本身便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人类的劳动对象也是自然。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石,正如列宁所言的“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气温。人类分布地区粗略地分为寒带、温带和热带。由于温带气候适中,提供了较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在原始生产阶段,气候又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温带—暖温带成为人类的发祥地和繁盛地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论断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我国主体民族——汉族聚居的地区正是处在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地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均是湿润半湿润的大陆型气候。黄河、长江哺育着这片土地,这一地理环境提供了种植业方面的“自然之富,物产之丰”,也正是这一环境使古老的中国农业获得滋生发达的优越条件,由采集业走进农业社会。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掘的距今六七千年的若干文化遗址中,多有石斧、石铲、石刀、石锄、陶刀等农具和用火遗迹,反映了远古人类刀耕火种的生活情景。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等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有数量可观的粟的皮壳,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则有稻谷存留,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汉族是最古老的农业民族之一。

在远古时代,农业较之畜牧业、狩猎业、渔业,是一种比较稳定、有劳就有获的生产形式。农业社会有助于人类建立安定的居住环境,有助于规律性的劳逸作息,有助于在家族血缘社会中共同生活,有助于固定场所的交换娱乐祭祀,有助于建立王权、法规、族法、家规等系统的宗法制度,所以它必定植根于民众之中,迅速形成一种生产模式、生活模式,成为一种文化形态,

固定、沿袭、延伸下去,形成一种价值取向,即古代汉民族所追求的从事周而复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农耕为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必然的选择,是一种符合黄河、长江中下游自然条件的思想观念。

历史也证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3],中原地区的古代部落首领能够统治天下,是发展农业的结果。中国素称“以农立国”,列朝帝王都有耕籍田,祀社稷祈求雨,下劝农令的仪式和措施,并且无一例外地把“重本抑末”作为“理想之道”。^[4]而中国农具制作、牛耕的发明、农书的刊行都著称于世。这就从另一侧面说明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族,采用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相结合。农民固守土地,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地主阶级的需要。

生存环境的先决,生产方式的固定,决定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内容。从远古起华夏民族便孕育、形成了尊崇农业的习惯,树立起了以农立本、以农立家、“以农立国”的观念,“农耕为本”的观念深深植于血液骨髓之中,成为整个民族生产的基本座标,成为劳动价值的惟一取向,土地自然成为从统治阶级到农民阶级的生命线。

“农耕为本”就这样耸起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西部“农耕为本”的举措——屯垦、劝垦

农业生产虽然有许多优越性,但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田,却无法繁殖衍生,在生产中扩大增长。而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却是可以繁衍增长的。在落后的科技条件下,人与田地产量的关系,并不正比例发展,相反,正常情况下往往是反比例。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人类只能不间断地向大自然索取,不断地开荒垦田,增加数量,把有限土地开成耕田,既使不利于生态保护的荒野也种植禾稼,结果造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链条,即人口增长→再扩大垦荒面积→人口再增长→又垦殖农田,不断循环往复,整个生态环境趋向恶化,生态链条紊乱错位,自然灾害不断加剧、增多。

地主阶级的代表——君主皇帝建立的统治政权,它的统治象征也是土地,榨取的财富源泉也是土地。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贪欲,它一面残酷高额地剥削农民,搜罗农产品,另一方面又通过战争来“开疆拓土”。掠取土地的目的就是将其转化为农田,以扩大财富来源。大量的不适于种植业的草原、荒野在“以农立国”价值取向和“农耕为本”观念的作用下,被辟为农田。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推行农业这种单一的生产经营方式,观念上认为务农才是正业、才是正宗,其他生产方式却在排斥之列。

西部规模性地垦田开荒,从汉王朝开始。

公元前61年(汉宣帝神爵元年)为镇压青甘一带羌人的反抗,汉宣帝派将军赵充国统兵进击羌人。赵充国打退羌人的进攻后,乃三上“屯田奏”,汉宣帝准奏,此后,青海东部大量屯兵移民,湟水流域直至青海湖附近的畜牧草场被垦耕为田,林木大量砍伐,植被受到破坏,农耕逐渐成为当地主要生产方式。经营畜牧业的羌人部落被迫从湟水中游迁徙到青海湖西岸一带。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在今青海湖北岸,设置西海郡(今三角城),下设5县,大量移民,并立法50条,违者被徙置西海郡垦田种地。徙者以千万计,内地农民浪潮般移居西海郡,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青海东部随之成为农业区,农业变为当地主体产业,“农耕为本”的观念也深深植根这一地域,其他产业或受抑制,或被排斥,人们的生活衣着基本依赖在农业上。公元102年(汉和帝永元十四年),东汉王朝占领羌人故居大小榆谷(今青海同仁、贵德等地),认为此处土

地肥沃,饶于田畜,又有西海鱼盐之利,便广设屯田,生产粮食。后来,在归义和建威两处屯田 27 部,在今青海化隆甘都滩、群科滩屯田 5 部,在青海贵德黄河北增加屯田 2 部,共设屯田 34 部。农业已成事实上的民生根本大计,凡是水草丰茂的草地都成为农田耕地。

汉代历世皇帝都坚持并加强了农耕为本的生产经营方针,甘肃河西走廊原属羌人之地,但因“土地肥壤,灌溉流通”,被开成耕田,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沃野变成了田地。

新疆也是最早受“开疆拓田”方针伤害重灾区。公元前 1 世纪,汉武帝太初年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渠犂屯田。以后屯田据点扩展到楼兰、车师(今吐鲁番)、伊循(今米兰地区)、赤谷(今伊塞克湖南)。至东汉,屯田又有进一步发展。屯田地由南疆发展到北疆,从匈奴手中“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伊吾卢即今哈密地区)。

西部第二次垦田移民高潮掀起在唐代。

唐在新疆戍边屯垦的规模较之汉时更大。据《唐六典》记载,唐在新疆地区的屯田有:安西(今库车)20 屯,疏勒 7 屯,北庭(今吉木萨尔)20 屯,伊吾 1 屯,天山(今托克逊)1 屯。屯田总数约合今天的 28 万亩左右。唐玄宗时期屯田军队达到 10 万人左右。

隋唐在青海的屯垦规模及力度也较大。隋朝大败吐谷浑后,遂以其国都伏俟城为治所,置西海郡;以赤水为治所,置河源郡,迁徙内地轻罪犯人到二地居住,在河源郡的积石镇大开屯田,统兵戍守。唐朝以青海鄯州、廓州为中心,屯田拓边,扩大农耕面积。随之移民增多,河湟流域的土著民族被逐往更边远的地区,畜牧业、狩猎业被挤出,以汉人为主体的农民群体成为当地的多数民族,农业经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农耕为本成为西部生产经营的根本方针。

元、清王朝继承了“以农立国”的传统观念,在西部依然屯田开荒,扩大农耕面积,把农耕作为解决国家生计、扩大财富的惟一途径。元代在新疆的屯田地点,扩展到了喀什、斡端(今和田),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3 个地区。由于屯田的规模不断扩大,元朝政府还于 1282 年在别失八里设立冶场,铸造工具,解决所需农具。18 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后,主要在军队占领的地区,如哈密、巴里坤、吐鲁番、辟展(今鄯善)、额尔齐斯河流域等地实行屯田,安置兵丁,动员移民,把这些地方变为农业基地。

清王朝在青海多次“劝垦”、“招垦”,宜垦的荒地多诱导人民积极垦殖。

乾隆五年还下诏:“凡边地零星地未垦者,悉听开垦,永不起科,严禁豪强争夺。”此后近百年期间,开垦风行,西宁四川至无不垦之地。乐都、贵德、大通、湟源等地的垦数也相当可观。屯田增长率西宁为 20%,碾伯为 16%稍弱,大通为 8%强,贵德为 54%,总共垦荒地为 7 646 顷又 35 亩。劝垦、招垦伸展到了黄河上游的贵德等所有气温较高较湿润的河谷地区,而不理睬当地植被的单薄。

光绪年间,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会同陕甘总督升允奏准重办青海垦务,派员往黄河上游沿岸牧区勘察蒙藏民居住地区的可耕之地,并由蒙藏王公、千百户出具“缴地切结”,令其所属招集垦户领地承垦。结果,黄河上游沿岸的垦田虽一时解决了一些粮食问题,但却为沿岸的沙化埋下隐患。

在旧中国,由于观念的错误导向,谁开荒垦田数量多,谁就被世人赞颂为历史的功臣。社会风尚的诱导,使传统的“农耕立本”观念根深蒂固地渗透进整个社会的血液骨髓中,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习惯的思维指导模式。

西部“农耕为本”史的后果

封建统治阶级“开疆拓田”的扩张方针，“劝垦”、“招垦”的政策，给西部乃至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什么后果呢？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农耕为本”、“以农立国”的观念给西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据考察，新疆地区汉时的三十六国和汉唐的屯田遗址，有许多现在已经消失了，如楼兰、精绝、阚货逻、犂弥、古且末、古轮台等。如果进一步考察他们为什么消失或废弃的原因，结果大多数埋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中了，有一部分成为碱滩。像古且末、尼雅、且当乌力克、阿克苏比尔等都是被沙漠埋掉的，而汉时的轮台、渠犂等遗址则是被盐碱吞没的。这些为数不少的古城之所以废弃，两大因素是：沙漠化、盐碱化。

可以想象，这些古城和屯田遗址，当初肯定不是在沙地上建起的，更不可能把沙漠开垦成良田的。那些地方肯定有着适于人类生存的河流沃地，有着人类可索取的多种动植物；肯定人烟繁稠，交通便利，物产富饶。但它们为什么会被沙漠淹埋，被盐碱吃掉呢？

首先要探讨的是生态条件。环境的恶化肯定是主要原因。

汉唐时代，青海、新疆的生态条件，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档案，但当时许多诗人写就的诗词却为我们做了脚注，参考价值很大，既真实又形象，恰似今天的电影纪录片一样。

最初屯田的生态条件情景如何？

诗人戴叔伦的《戍田词》写的是屯田士兵的日常生活：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
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
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余枯茎。
捕蝗归来守空室/囊无寸帛瓶无粟。
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
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

从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屯田士兵的艰辛难熬生活，更多的是严酷自然环境：遍地砂碛的贫瘠土壤；“天苦晴”的干旱天气；飞蝗蜂涌，青苗食尽，颗粒难收的蝗灾；霜重草枯牛冻死的严寒天气。在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推行“以农立国”、“农耕为本”的生产方式，其结局可想而知，只能是自食苦果。

青海、新疆等西部边塞地区极力“劝垦”、“招垦”，寄托了许多人“富国强兵”的美好理想，但这些地方适不适宜农耕呢？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在《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描述了新疆大漠戈壁的自然环境：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飞。
……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诗行活生生烘现出新疆平沙莽莽，九月风吼，碎石如斗，随风乱走的恶劣环境。试想在这

样的地理条件下,农耕能立住脚、扎下根吗?风寒凛冽到如刀割面的程度,粮种还能抽芽发育吗?答案自然是明确的。

对于新疆、青海的气温、地理,其他唐诗都有精彩的描述: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剑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寒、冷、大风、高海拔、冬长夏短、气温低、无霜日少,这便是当时西部气候的特色,是西部大自然的基调。

虽然“劝垦”、“招垦”在某些局部区域,某段历史时期带来了繁荣,增加了粮食产出,但对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却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种地理条件使草木生长受限制,新陈代谢过程缓慢,泥土沉淀不厚,且难以保持,从而形成植被单薄、肥力不足。表皮土层在青藏高原,一般只有5至7厘米。相反高原大风(≥ 8 级或者17米/秒)年平均日数为100~150天,最多可达200天。风力大,持续时间长,就给单薄的植被造成巨大危害。

沙化是干旱少雨、风大风多地方的一种必然现象。土壤的物理组成是沙、石与泥土混合物。由雨水粘合在一起的是泥土尘埃,沙粒则是石块分崩而成的颗粒。大风一来,首先吹掉了水份,接着吹掉泥土,而留下来的便是沙石。土与沙石分开,缺少了粘合剂,沙石就更松,存不住水,就更要干旱,干旱就更容易造成沙化。尘土飞扬以后的沙石,因为没有固沙泥土,便成为流沙,遇到障碍则聚积成沙丘,发展为沙漠。

广袤的新疆是最易沙化的地域。这是一个干旱少雨、风大风多的地域,内陆河流,封闭盆地,水资源有限且受到沙漠的侵蚀,气候极端干旱,盐碱没有出路,沙漠化和盐碱化是新疆农业的两大拦路虎。青海何偿不是如此。春季来的迟又伴随着剧烈气流,大风时间长且猛烈,被开垦过的草地一览无余地裸露土粒,大风一来,土粒滚动松脱,土尘上天,顷刻间形成沙尘暴。可以看出,在西部,滥垦滥开是破坏土壤植被,造成沙化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

在任何风大风多雨沙干旱的地方,深耕细作意味着直接破坏草根的固土作用。耕得越深(尤其是机耕),下面的泥土翻上来的就越多,泥土被大风吹走也就越多,积聚的沙层就更厚了。土块打得越碎越细,泥土就越松散,就越容易被吹走。实践证明,在西部,垦田与土壤的沙化、贫瘠化现象是孪生兄弟。

虽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互有消长,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废弃了屯田的垦地,重新恢复为牧场。但植被元气的严重损伤,使自然地理环境无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迹,仍然无法阻挡沙化、贫瘠化扩大蔓延的趋势,这从历史的镜子中可以鉴照。

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在殷商王朝到北宋的2400年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明中心。那时,黄土高原并不缺少绿色,四五千年前有森林4.8亿亩,覆盖率高达53%,其余土地也多为草原和稀树草原。陕西渭北一带在西周时林木丛生,熊黑出没。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的汾河流域,南北朝时山峦“翠柏荫峰”,河谷中“杂树交荫”。晋南豫北“高林秀木,翹与楚争茂”。黄河南岸内蒙古伊克昭盟现有两片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在一两千年前却是“临广泽而带清流”,有森林、有老虎。公元413年,匈奴首领赫连勃勃率10万之众,在此择地建都,筑成规模宏大的统万城。直至唐代,统万城仍为北方重镇。而今,统万城已淹没在毛乌素沙漠之

中。

秦汉时,甘肃一带有“大小乔木,连跨疏郡,万里鳞集,茂林阴郁”的记载。甘肃南部,今日以“千山秃岭和尚头,庄稼十年九不收”而闻名的会宁,宋朝时还是“以鞍马涉猎为事”,“重重赭林迷樵径”。河西走廊流经武威的石羊河下游曾有一休屠泽,西汉时在这里设有武威郡和武威县。随着祁连山森林破坏和石羊河中游农垦开发,时至清朝,休屠泽干涸,汉、唐、明代的古城随之被沙漠吞噬。

今日的嘉峪关已是一片戈壁荒滩,而在魏晋时代却是一片繁华的绿洲。在长城始建之初,长城所经的西部地区,曾经“森林广布,水草肥美”。到明代的成化、嘉靖年间(1475年—1541年)重修长城时,只有“凡草茂之地筑于内”的记载,可见当时的荒漠化虽有发展,但仅见于长城之外。其后,长城沿线实行军屯民垦,出现了“数万里荒地尽耕,孽牧遍野”的景象。17世纪中叶,清王朝改禁垦为放垦,再次加速了长城地区森林草原植被的破坏,结果沙化严重,大部分区域为一毛不长的戈壁滩。

新疆的耕地在半个世纪前有1820万亩,而今已达6000万亩,其中大部分是从胡杨、红柳及其他灌草植被中开垦出来的。

灌草植被的被破坏,使土质失去依赖的固泥固沙的根基,不得不走向沙化的道路。新疆沙漠面积达75.4%;在74.68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中,沙漠则达到56.4%,相当多的县市都有大面积沙漠分布,一个中原恐怕难以排斥历史上大面积的垦荒。

旧的史书过于倾向于政治事件的记载,而忽略了自然灾害的实录,我们无法准确知道由于土地沙化、贫瘠化而引发的灾害数据。特别是间接引发的旱灾、蝗灾、水灾(淤塞河道)、沙丘掩埋等灾害。但从沙化、贫瘠化给西部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旧社会频繁的灾害中,很多是因为贯彻“农耕为本”的指导思想,垦荒过多引起的沙化、贫瘠化导致的。

全国“以粮为纲”的教训

任何行动纲领只要符合自然法则,符合实际情况,就存在号召力、凝聚力、辐射力,就能率领人们走向进步、革命的道路,反之,则会破坏生产力发展,给人类带来灾难,给社会造成羁绊。在气候湿润暖热、植被丰厚肥沃的地区,在科技低下、人粮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领导集团,提出“以粮为纲”的方针是正确的。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有上千年农耕传统的农业大国,全民中绝大多数衣食来源依赖于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生产经营方针,是现实的,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如果逾越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地貌千差万别,气温、海拔、风力、水资源条件悬殊很大,宜耕面积较之其他国家要少。且不说西部严寒高海拔占去了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即使湿润带的地区,原野并不多,好多是石岩陡壁沟壑深涧高山红土坡,不具备大面积农耕条件。这样,生产指导方针就不能机械化,搞一刀切,而需要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笼统地提出全国以粮为纲就存在片面性。在和平环境下,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的急剧增长,引发粮食问题的严峻化,但这并不能作为不适宜农耕的地区就得以粮为纲,去种粮食作物的依据,更不能凭人定胜天的意志去种粮食。自然界铁的法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地理环境是难以根本改变的。人类只能因势利导,利用大自然的能力服务人类。但在这点上,我国偏偏出了大问题。

解放以后,在“农耕为本”传统观念的驱动下,我国生产经营领域采取行政命令、计划经济

的方式,强力推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地不分东西,人不分民族,粮食产量成为农牧渔猎业最基本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垦荒热潮,特别在西部,垦荒成为建设的重点内容。

最早是新疆屯垦。10万大军改建成生产建设兵团,内地支边青年又源源不断加入这一洪流中,前后共建立169个农场,开垦荒地1300万亩,占全疆耕地面积的30%,农场遍布大山南北、各条大河流域。在西藏,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为了解决给养,也在世界屋脊开垦了许多荒地,建立了不少农场。

在这次热潮中,开荒中卷走的除了不少高原难以成材的灌木、胡杨等珍贵树木外,还有大量的河滩山坡草皮荆棘林。植被裸露,就为风化、沙化创造了条件。另外,人们还忽视了开荒者为解决炊食、取暖问题而大量砍伐树木,刨去草根,砍掉红柳等固沙草木的事实。开发柴达木盆地,数十万人进入只有沙柳、草根的盆地,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还吸引来移民和工作人员的剧增,造成当地生态的压力加大,各地为解决燃料、房建需要而砍伐采产的数量以几何数增加。一日三餐,漫漫冬夜,日积月累,年年如此。虽然没有人统计过,但肯定超过垦田数倍。据有关资料佐证,西藏阿里狮泉河一带,五十年代以前红柳遍地不见边际,解放军牧羊,鞭杆上得栓一红布作信号,不然人畜淹没其间难以联络寻找。但以后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多,大量红柳连根被砍走填充燃料,或作为建材等。如今的狮泉河,不仅红柳远遁,而且沙丘迭起,一旦起风,沙飞石滚,门窗积沙,快成沙洲了。似类情况在西部比比皆是。

50年代中期,随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西部掀起了第二次垦荒的热潮。这次热潮的特点是移民垦荒。国家通过政府及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大造舆论,有组织地从内地人口稠密地区,如河北、河南、上海、天津、山东等地移民和动员青年志愿者去西部,特别是到地广人稀的青海、新疆、甘肃南部大量开垦草地、生荒地、河滩地。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要求在1962年以前完成570万的移民支边任务,即河北去内蒙古50万人;河南去青海65万人、甘南15万人;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去新疆200万人……,四川省由川东去川西100万人……。两年内,16个省(区)及部队共动员安置支边青壮年和退伍兵99.7万人(另有随迁家属44.6万人)。在藏族人口只有13.7万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计划从1958年起,移民70万人,建立大型农场16个,开垦荒地200万亩。

1960年至1962年,为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政府又号召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掀起开荒垦田的第三次浪潮,部队、机关均开荒耕地,大办农场。

1960年至1962年,陕西、甘肃、宁夏、山西4省(区)共开垦耕地66.6万公顷,其后30年耕地面积又扩大了两倍,过度的垦殖、樵采和放牧,不但使林业和畜牧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种植业生产也受到了生态恶化的抑制,其结果,农、林、牧三败俱伤,老百姓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

70年代,全国紧锣密鼓地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以粮为纲”的弦越绷越紧,扩大耕地面积、追求粮食产量成为全民的理想座标。

总之,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国政府从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西北地区先后掀起4次大规模开荒高潮,共开垦森林地带300万亩,开垦草地1亿余亩。近十几年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一些省、区继续出现了毁林毁草垦荒热。

拓田垦地就像一个幽灵一直缠着中国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就以水草丰美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来说吧。1958年至1960年国营农场在呼伦贝尔草原开垦土地1000万亩。现代

化垦殖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掘土能力,把地下粉沙翻将上来,在地表造成风沙活动区。开垦后短期内即出现风蚀沙化,3年后即撂荒226万亩。1988年至1995年,呼伦贝尔又毁林毁草新垦耕地500多万亩,造成河流干涸,草场退化,全盟出现4条流动沙化带,往昔“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竟变成风沙肆虐的温床。正是在“以粮为纲”、“以农立国”、“农耕为本”传统思想的导向下,诱发了西部大量开垦草地、林地、荒滩地。“饮鸩止渴”,自食苦果,造成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形势相当严峻:一是土地退化加剧,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我国水土流失总面积367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占80%。土地荒漠化面积262.2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也都集中在西部地区。二是水生态平衡失调,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新疆艾比湖水面已从50年代的1200平方公里萎缩成现在的500余平方公里。青藏高原的湖泊有30%以上干化成盐湖或半盐湖,黄河源区有不少湖泊已经干涸。同时,地下水超采现象十分严重,加速了土地荒漠化和气候干旱化的趋势。三是林草植被覆盖率总体不高,质量和功能下降。西部天然林比例、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均呈下降趋势,西南地区尤为突出;西北地区森林覆盖整体偏低。我国草地退化面积约1.35亿公顷,绝大部分在西部。退化严重的地区平均产草量下降30%~50%。四是城市和工业集中地区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流经城市的河流污水污染更是严重。西北地区自然降尘水平高,城市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很多城市布局于山谷平原地区,影响了空气扩散,煤烟型污染严重。1999年,用空气综合污染指数衡量,全国47个环境重点城市中,按污染严重排队,西部有5个城市高居前10名。其中乌鲁木齐、兰州、重庆、西宁、贵阳等城市的空气分别列居第二、四、六、七、九位。另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还直接影响着东部和全国的环境安全。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一方面严重的水土流失,使中下游河道、湖泊淤积,悬河、悬湖增多,调蓄洪水能力降低,加剧了洪涝灾害;另一方面,黄河上游水生态平衡失调,江河断流,直接影响了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同时,生态恶化导致强沙尘暴频繁发生,西北成为我国华北地区甚至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风沙源。

据最近报道说:中科院20多位科学家在深入我国北方荒漠、戈壁、绿洲地区,对沙尘暴发生过程和主要尘源区进行实地观测和考察后,得出了未来几年沙尘暴仍呈增加之势的结论。对沙尘暴的研究表明,近50年来,真正的沙物质不是来自原生戈壁或原生沙漠区,而是来自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后新生的沙漠化土地。

这就从科学认识论角度验证了西部坚持“农耕为本”的传统观念、“以粮为纲”方针的局限性、危害性也在实践上宣布了大量垦田活动的弊端。

另据权威机关的资料,新疆属西风环流多风地区,我国60%的沙漠分布在新疆,其境内荒漠化的土地(沙漠和戈壁)达到79万平方公里,这就使新疆成为中亚沙尘暴发作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统计资料还显示,自1949年以来我国发生的10次特强级沙尘暴灾害中,有7次就发生在新疆。吐鲁番、哈密、和田成为多发地带,累计损失达10亿元。

历史对“农耕为本”的批判

大自然对我们的惩戒是无情的、残酷的、直接的,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深刻的、全面的,其中要明了的警示也是朴实的、严厉的。归纳起来,历史在对“农耕为本”观念的批判中,予我们的启示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农耕为本”不是万能的，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包涵有片面性，固执地抱着“农耕为本”的观念不放，只会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失衡和恶化，生存空间的缩小污浊，最终作茧自缚、危及自身、堵塞子孙后代发展的道路。西部垦荒历史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二、摒弃上千年积淀的“农耕为本”观念，树立辩证唯物主义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理论上有所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不然，容易发生反复，又走弯路的可能性大大存在。我国解放初期也曾制定过法规法令，禁止国家机关、部队开垦草原，尤其在青藏高原。但由于观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耕为本”意识一直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一旦出现适当的政治气候，就自动跳出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和价值取向予以实践。最能说明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规模垦荒运动。青海省曾提出牧区“以开荒为纲”、“牛羊上山，粮田入滩”，把牧区变为青海的粮食基地等口号。全省当时共开垦牧区草场570万亩，其中210万亩因当年全无收成而弃耕，造成粮畜俱败。劳改系统在青海湖周围开办农场，开垦荒地55万多亩，使昔日秀美的青海湖变成风沙频繁的荒漠地。

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青甘藏区又遭受草地变垦田的劫难。

如此反复，说明“农耕为本”观念在全民族特别是汉族中的顽强地位。所以说，要想轻而易举地转变是困难的。“农耕为本”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也只能在历史实践中消失，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反复说服，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通过视野开阔、胸臆拓展，在比较中逐渐淡化、转变。这将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其艰巨性、反复性，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列入基本日程予以认真解决，一旦疏忽或掉以轻心，则可能走回头路，受大自然更严厉的惩罚。

三、从严格意义上讲，“农耕为本”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小农经济状况不改变，“农耕为本”意识就难以改变。只有跨入现代工业文明，步入电子时代，“农耕为本”才有望退出历史舞台，才会失去市场。多种科技产业的齐头并进是关键。要防止类似现象出现，最根本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科教兴国”的根本方针，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形成工业文明体系，促成国民素质极大提高，科技知识水平普及丰富，视野极大拓展，辩证思维深深扎根，科学、全面生产经营意识的树立。唯有如此，“农耕为本”的意识才会被铲除根基，受到全民族的摒弃，也才能断绝“复出”的土壤。

四、广泛的全民科学态度、民主氛围，是遏止“农耕为本”、长官意志的利剑，也是堵截“农耕为本”决策为害的杀手锏。长官意志体系中除观念意识的作祟，还参有急功近利、侥幸取胜、迎合上级需要的成分。科学的剖析、全民的参与，就使某些长官的垦田蓝图得经受科学的考察，全民的考证，就能防止错误思潮、错误决策的蔓延，防患于未然。

五、“膳食结构”的改良，国民饮食主副食传统习惯的改变，有助于减少对“农耕为本”的依赖倾向，淡化对粮食产品的需求，消除“农耕为本”观念的地位。

六、沙尘暴是由土地风化、沙化引起的，土地的风化、沙化、盐碱化，还会引起什么灾害呢？旱灾、蝗灾、鼠灾、火灾甚至因泥沙堵塞河道而发的洪灾，等等。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任何灾害都会造成几十亿、数百亿元的损失。仅仅沙尘暴，就能造成商业中断、交通中断、电力中断、电讯中断、工业中断，而其他灾害带来的危害更是可怕。同时，沙化酝酿的灾难有着量变到质变、跳跃性发展的特点，它能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易地为害、连续发作，越到后来越严重，越频繁的特点，因此，举国上下都对土地风化、沙化的后果，对风化沙化引发的直接或间接的灾害均应有全面、深刻地认识，加强灾害意识，不抱侥幸糊涂观念，不消极应付敷衍，要以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为戒，年年、月月、日日诵念消灾经，树立从根本上治理的思想，克服就事论事、治表不治根的

浮躁心理。

七、国家决策要坚持科学论证、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多方位、多角度,立体地制定各地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切合实际地提出生产座标和指数。在生产经营方针和内容上,不搞一刀切,不搞长官意志,不搞大轰大鸣运动或掀起形式主义的高潮。而这些,最根本的是需要法制来保障规范。目前,西部生态平衡建设仍然有着长官意志,有着形式主义痕迹,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追求数量及表面文章,而不讲社会效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拿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来说吧,历史上从未长成树林的干旱、高寒地区(又缺乏一定的灌溉系统),靠天吃饭的地区,是应该先种树还是先种草,答案自然是先种草。等牧草形成涵养能力覆盖土壤,固住沙后再种树,树才能活下来,这是符合自然轨迹,有利于恢复生态环境的正确途径,但现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却反其道而行之。在长官意志下,不顾老百姓的异议,剥掉草坡、开垦林带、植树造林,结果大风一来植被刮光,黄土地裸露,表层风化、沙化面积反倒更大更厉害了,今春,西部沙尘暴持续不断,其中不乏上面之原因。

On the Influence of Farming History Upon the West development Thoughts Upon Sandstorm

Gazangcaid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Research, Northwest Minorities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raditional farming understanding, the continuous cultivation caused desertization and wilderness of vast land in West China; even after the liberation, such cultivation movement was not well guided under the unreaso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To avoid such mistakes, we must correct the partialiti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ideas, develop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s and establish scientific, comprehensive and suitable production policy.

[Key words] Ideas of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farming and analysis of its result; reflection of the nature; sound production policy.

(责任编辑 贡保革 责任校对 董河燕)